

“中国顶峰论”实为“西方顶峰论”综合征的症状

◇[丹麦]李形(Li Xing) [瑞典]扬·奥伯格(Jan Oberg) 任冠虹/译

自 16 世纪欧洲开始全球扩张以来,奴隶贸易、殖民、以炮舰打开他国大门的所谓“自由贸易”以及世界大战等接连出现。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世界经济逐步吸收了多种社会文化制度,从而形成了统一的经济体系。通过殖民,非洲和拉丁美洲在几百年前便已被纳入这个经济体系。

中国为世界经济注入新活力

世界经济体系内部的分工导致了商品、劳动力和资本通过生产、交换和投资链在不同地理区域之间流动。由于世界经济体系内始终存在分工,“核心一半边缘一边缘”不平等关系的差别将永远存在。换句话说,在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中,各国的地位是分层的,而这种分层代表了在相互联系的经济中各国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

世界经济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国家有机会通过全球资本流动和生产转移,改变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每个全球性大国,往往都会在一定时间内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其后也会在“系统性积累周期”中经历衰退。这种衰退是由资本积累的系统性危机的反复发作导致的。当前,全球资本积累就正在经历这样一场以兴衰更替为特征的过渡。中国崛起为一个新的中心,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新活力,这是世界经济的动态性和复杂性的真实写照。

中国几十年来的高速经济增长为全球经济注入强大推力,世界各国有目共睹。中国的市场规模及其融入世界经济的广度、深度,导致西方对其自身的经济主导地位产生了“不确定感”。中国在金融、货币、贸易、环境问题、资源管理、食品安全、原材料和产品价格等方面的政策受到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的这些政策对于其他经济体来说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力。这是

因为中国供求的变化能带来价格变动,从而引发其他国家的相应调整。基于这个逻辑,中国越来越被视为全球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西方对中国掀起认知战

西方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和塑造力的国家。2013 年以来,中国提出了多项全球倡议,诸如 2013 年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2021 年的全球发展倡议、2022 年的全球安全倡议、2023 年的全球文明倡议,以及 2023 年 9 月中国外交部向联合国递交的《关于全球治理变革和建设的中国方案》。西方将这些倡议视为中国打造“替代性世界秩序”的蓝图,或者是一种带有中国特色的世界秩序的宏伟愿景。在过去几百年里,世界秩序一直由西方主导,霸权的位置在西方内部更迭。对于西方来说,很难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一个非西方国家正在对全球秩序产生重大影响。纵观世界历史不难看出,世界秩序并非静态不变,而是受到新兴大国崛起和既有强权抵抗等因素的影响而不断变化。当今世界发生的系列重要事件,可能会成为世界秩序转变或重塑的“关键时刻”,比如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俄乌冲突、中国斡旋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恢复外交关系,以及当前的巴以冲突等。世界秩序的演变往往与全球性大国的应变能力密切相关,历史上世界格局的演变都是由于现有大国无力应对新兴大国崛起所带来的世界经济和政治局势波动所引发。

以上就是西方主流媒体和学术界炒作“中国顶峰论”(peak China)的背景。“中国顶峰论”的意识渲染体现了现有守成国的恐惧、失控和拒不接受的心理,反映出它们试图削弱或否定非西方大国崛起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历史上,西方一直试图按照自身想法改变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早期来自欧美的传教士曾尝试在中国复制基督教在西方的影响力,但他们未能如愿。尽管中国积极学习西方思想和技术,但始终保持着自己的

历史和文化传统。因此,围绕“中国顶峰论”的渲染实则是西方掀起的一场认知战,旨在说服人们相信中国的崛起是短暂的,且西方长期标榜的政治制度模式依然是世界上唯一可取的模式,没有其他更好的替代方案,也就是福山所谓的“历史的终结”。

历史是一个永恒发展和演变的过程,永远不会有真正的终结。简单的宏观历史视角告诉我们,帝国往往会经历兴起、繁荣、衰落和灭亡的过程。这些过程可能由多种因素引发,包括过度扩张、缺乏创新和远见、战争和军国主义、合法性削弱以及其他新兴大国崛起等。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身处顺境太久,傲慢与冷漠滋长,拒不认可时代变化。

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

显然,人类以及由人类组成的社会体系和国家往往难以面对自身的衰退,对此予以否认并试图逆转衰退是常态,但会有实效吗?逆历史潮流而动是否意味着加速衰落和被孤立,是否意味着放弃通过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机会?衰退可以是悄然无声的,也可以是爆炸性的,这取决于所采取的策略和行动。

可以说,具备诸如此类的宏观视角是观察 21 世纪初全球政治的基本要求。由于日常新闻通常聚焦于微观层面的事件和情况,因此,在研究者、政治家和媒体中,宏观视角往往不如微观视角具有吸引力。但微观和宏观无疑是紧密联系的。

在帝国衰落和世界秩序变革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可能是必要的,但还不够,还需要借助心理学、宗教学、文化研究等,来帮助我们 from 不同的角度和层面理解复杂的现实情况。例如,近年来我们反复看到,西方倾向于将自己的负面特征和行为投射到其他主体,指责其他国家或地区,但却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和过失。西方主流媒体常常夸大外部威胁和挑战,将自身危机归因于外部因素,而对内部存在的问题视而

不见。这种状态容易引发一种偏执情绪,认为其他国家都联合起来站在自己的对立面。

这种自我观和世界观是否符合事实并不重要,因为群体情绪、感知和一系列自以为是假设,会导致对事实的误解和夸大。西方可能会通过强调自身在某些方面的优势来维持自己的权力地位,从而导致世界经济体系失衡。美国在军事上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而在经济、文化、政治、外交和媒体方面的影响力却在下降。

在西方对中国持续采取冷战式态度和政策的背后,可能存在许多其他因素、机制和动机。西方试图通过建立军事基地和多维度影响机制,来维护其在全球范围内的主导地位,因此会对其他不断发展壮大的国家采取警惕和敌对态度,他们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其出发点可能是基于维护自身利益和地位,而非真正的国际规则。

陷于停滞甚至衰退的强权往往认为自己能够战胜挑战,因此会出现持续不断的抹黑他人的行为。例如,在某些问题上不断扭曲、编造事实。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媒体大多怠于了解中国、中国人的思想和想法。衰落者的信条是:我们没有什么可学的,我们只需要教育别人。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那些反复出现的预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即中国已经达到顶峰,而“我们”将仍然是全球唯一的“不可或缺”的强权。

在这样的时代,对于正在崛起的多极世界来说,最明智的策略就是以耐心、温柔和理解甚至同理心来行事。各国应当坚持自主路线,根据自身的利益和发展需要制定战略,积极推动多极世界的建设和发展。因为,根据预测达到顶峰的是西方,而不是“全球东方”和“全球南方”。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云山领军学者、教授,丹麦奥尔堡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瑞典跨国和平与未来研究基金会教授、联合创始人)

边库迪:“文明冲突论”和“文明优越论”等概念在国际学术界和政治环境中有着激烈而巨大的争议。“文明冲突论”在塞缪尔·亨廷顿 1993 年的文章中首次提出,随后通过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得到推广。亨廷顿在书中认为,未来国际舞台上的主要冲突将不是基于政治意识形态或经济利益,而是基于世界几大文明之间的文化和宗教差异。

“文明优越论”是文明隔阂、文明冲突的理论基础,其实质是坚持西方中心主义。批判性地审视这些观点,对合理化当今国际关系至关重要。从历史上看,西方文明时常将自己定位为比其他文明天生优越、高尚、更有价值的文明类型,并以此为其在海外开展的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文化统治辩护,这导致了极大的不平等、怨恨和冲突等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同时忽视了非西方文明的独特价值。不可否认的是,亚洲、非洲等地区文明在科学技术、哲学艺术等方面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与非洲国家虽都有过遭受西方殖民的经历,但这一经历从未曾使二者在历史面前低头,反而增强了他们保持各自之间面对面的独立性与自主性,这与西方由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化开启的殖民化叙事形成鲜明对比。

必须认识到,没有一种文明能够解决所有现代问题,每种文明都有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文明也并非封闭或孤立的存在。今天,全球多种文明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相互依存,并以一种综合和混合的文化形式呈现,这使得超越文化和文明鸿沟的理解与合作变得尤为重要。通过贸易、移民、通信技术和国际合作实现的全球相互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证明了“文明冲突论”和“文明优越论”的错误性。

在此背景下,关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而非基于文化或文明差异的分裂,对维护全球稳定与和平至关重要。我相信,在未来,随着中国和非洲之间互动的不断深化,中非文明交流互鉴会历久弥新,这将促进二者思想和实践的进一步融合,产生对彼此新的共同理解和相互欣赏,并为异彩纷呈的人类文明贡献新的力量。

关注全人类共同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报》:今天,“文明优越论”与“文明冲突论”在西方依旧甚嚣尘上。长期以来,西方文明一直倾向于排斥其他类型的文明,尤其是亚洲文明和非洲文明。您对此有何见解?

交流互鉴为人类文明贡献新力量——访尼日利亚阿布贾大学副校长阿伊沙·萨尼·迈库迪

◇本报记者 白乐

自习近平主席 2023 年 3 月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以来,中非人文交流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契机。作为世界文明的多彩一极,中华文明与非洲文明交往的历程和经验已成为非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最佳典范。相似的历史遭遇、相近的奋斗历程、相同的发展任务,让中非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始终携手共进、同向而行。为探究中非文明交流与交融的历史与现状,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尼日利亚阿布贾大学副校长阿伊沙·萨尼·迈库迪(Aisha Sani Maikudi)。在迈库迪看来,中华文明与非洲文明在价值体系、历史轨迹、宗教哲学等方面都存在诸多共性。在国际纷争冲突频发、世界秩序变革加速推进的今天,中非文明对包容性与互信观的崇尚与追求,将共同为和平世界的构建带去曙光与希望。

中非文明互动跨越几个世纪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非文明在历史上的交流有数百年之久。长期以来,中华文明和非洲文明一直在相互欣赏、相互借鉴,对此您如何看待?

迈库迪:中华文明与非洲文明之间的历史性互动可谓超越时空,这一互动跨越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岁月。有研究证据表明,早在中世纪时期,通过阿拉伯商人,这两大文明以一种间接方式开展了早期的往来与接触。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往来见证了中非文明交往的悠久历史。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商品贸易交换之路,还是观念与文化交流之路,许多学者与艺术家在这条古老而又鲜活的文化航线上进行思想探索之旅。

中华文明与非洲文明的相互影响有着一系列史料记载。非洲语言与文学中可以寻见中文的影子,例如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等国的官方语言斯瓦希里语把中文词语当作外来语引入。明朝时期,郑和率船队抵达非洲东海岸,他对于东非部分地区的到访大大增加了双方直接接触的机会。郑和下西洋所开启的中非历史情谊为中非文明的未来互动奠定了基础。同时,非洲的航海家和

学者等也抵达中国,带去了新的想法。其实,早在唐朝就有非洲商人到访中国的记录。

在宗教和哲学方面,虽然中华文明与非洲文明的具体内容不同,但都存在对祖先的崇拜和对自然的敬畏等特征,这种传统至今仍影响着中国人民与非洲人民的个人行为和社会伦理。非洲和中国都有关于自然的一些丰富传统,例如非洲约鲁巴民族认为人类有义务维护自然环境平衡,而中国传统文化也十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家庭责任,这在许多同样高度重视个人与家庭的非洲社会中可以找到对应概念。中国一些玉制品象征和寓意着吉祥,体现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和世界观,而非洲文明中也有着类似的玉文化。此外,中非在纺织、雕刻、手工艺等多个方面都有着杰出的匠人传统,一些中国文化活动出现的非洲面具则揭示了非洲文化传统以及非洲社会的规范。

《中国社会科学报》:与西方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呈现出独特而鲜明的文化和哲学特性。在全球挑战层出不穷的今天,您认为中华文明的哪些元素在当今仍具价值与启迪?

迈库迪:我认为,中华文明深厚的哲学传统对于当今和平世界的构建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中国古代的“天下”概念,代表了一种将全人类视为共同体的全球视野,这一愿景可以指导形成更具包容性的全球治理结构。儒家思想注重在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观之间寻求平衡,将社会和国家福祉置于个人欲望之上。这种对集体福祉的关注、对群体利益的优先考虑,可以指导全球在应对贫困、医疗保健和气候变化等领域存在的挑战。道家思想则强调万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外部环境相适应。这一理念的启发是,对全球问题做出灵活的反应,鼓励韧性,面对新信息或不断变化的环境及时进行政策调整。《孙子兵法》等典籍中蕴含的战略思维则强调了远见和规划的重要性,这为寻求全球可持续发展方案提供了可贵的灵感。

对于和谐、平衡、协同的关注构成了中国外交的重要理念,也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重要典范。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强调领导者作为道德模范的作用,期望领导人以正直和负

责任的态度行事。将这些原则纳入国际决策可以鼓励采取更周到、更合理、更合乎道德的方法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紧迫问题,例如恐怖主义、流行病和技术中断等。可以说,中华文明的诸多宝贵元素提供了一个极具启示意义的文化框架,可以有效应对当今人类所面临的复杂挑战,促进国家间的信任与合作,并使世界各国从中受益。

中非文明交流互鉴呈现新特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时代以来,中非文明交流互鉴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您认为近年来中非文明交流互鉴有哪些新特点?

迈库迪:中非文明之间的互动在过去十余年来尤为频繁,并呈现出两个新特点:一是传统文化交流持续深化。例如,在民俗和宗教等方面,中非开展了许多文化交流。中国拥有戏曲、武术、书法等广泛的艺术形式,而非洲音乐、文学、电影等也在全球范围内广为流传,为此,中非共同组织了一些文艺演出与展览等。此外,不少非洲作者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拥有大量读者。

二是文化外交活动呈现新面貌。这些活动大多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开展。在当代,中非关系很大程度上由贸易、投资和基础设施发展来推动。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在非洲开展了一系列发展项目,这些项目包括修建公路、铁路和港口等,从而为中非贸易往来提供便利。中国企业还大量参与了非洲的矿业开采、制造业和电信业。这不仅极大地促进了非洲当地的经济增长,并在更深程度上推动了全球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也带动了中国历史文化主题的纪录片、电影、书籍、印刷品、电子作品的诞生,这些文化成果对于当今世界增强对中国的认知产生了十分积极的贡献。

本报综合外媒报道 近期,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学者举行了一场如何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在该区域研发合作与应用的研讨会。11 个国家的学者就启动人工智能跨领域合作与技术分享、制定发展战略和行动、更新人工智能资源等议题进行充分讨论。这些学者一致认为,人工智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有充分的发展潜力,可以带动该区域经济增长,但研发人工智能需要大量资金支持,这也是该区域国家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在研讨会上,与会代表首先就各自国家在人工智能发展中的经验和认识进行了介绍,因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进程各不相同,分享经验有助于该区域的整体性发展。其次,与会代表同意扩大国际科学理事会科学未来中心围绕人工智能正在建立的全球人际网络项目。

国际科学理事会科学未来中心主任马蒂厄·丹尼斯(Mathieu Denis)说,此次研讨会增进了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人工智能研究的战略理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可以围绕人工智能和科学系统开展更多领域的合作。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该区域的专家对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速度感到惊讶的同时,也担心自己将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处于落后状态。其实,从一些讨论的案例可以看出,墨西哥、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等国家在人工智能认知和战略发展方面已经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

与会专家还提出了他们在发展人工智能方面遇到的共同挑战。一是在各级教育系统中还未对人工智能教育给予重视。二是未形成明确的研究数据政策框架。三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硬件基础薄弱,计算资源获取困难。目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学者对数据政策和治理存在很多争论,这也导致有关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研究和讨论往往处于边缘位置。

参与讨论的一位专家表示,人工智能就是数据,好的人工智能应用依赖好的数据质量。但很多非人工智能专家并没有看到这一点,这是令人担忧的,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与会专家还对开放数据进行了辩论。首先,研究数据是否应该始终默认开放,或者是否应该把重点放在确保数据公平上。其次,如何决定哪些数据集可以开放,哪些不能开放。有专家提出,研究数据存在很多问题,如何收集整理数据、如何标准化和存储以及使用数据都存在差异。还有虚假数据的问题,它可能导致人工智能产生不真实的结果。因此,完善人工智能研究的标准和道德规范也十分关键。还有专家提出解决数据中嵌入的系统性偏见,尤其是针对少数族裔的偏见。这就需要学者们不断扩大数据收集范围,其中涉及各个领域和不同地区的各类数据集。

协作可以解决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例如,在该区域创建一个与人工智能研究相关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库。对此,哥伦比亚代表提到,围绕一些问题开展合作试点,可以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展示利用人工智能解决共同问题的合作价值。其他学者也赞同建立数据库可以为国家间、机构间合作建立桥梁,并促进监管和治理的互操作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还可以开展不同类型、双边或多边区域活动,将人工智能纳入研究系统。各国也可以确定一个或两个关键领域,进行人工智能系统研发。

(赵倩/编译)

《历史的缪斯：启蒙时代 21 世纪的古希腊》

◇奥斯温·默里/著

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将于 2024 年 9 月 10 日出版英国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荣休研究员、古典学家奥斯温·默里(Oswyn Murray)所著的新书《历史的缪斯：启蒙时代 21 世纪的古希腊》(The Muse of History: The Ancient Greeks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该书探索了现代人是如何理解古希腊,以及古希腊为何在今日仍具有重要性。

自文艺复兴以来,关于古希腊的研究一直是西方历史观的核心。过去三个世纪里,一代又一代西方人在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下重新解读古希腊,默里在书中对这种变化模式进行了追踪。18 世纪,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冲突成为共和主义发展的试金石。到了 19 世纪,雅典被视为民主理想的象征。在 20 世纪的意识形态冲突中,古希腊被想象为一个苦难的时代,激发人们抵抗民族主义、纳粹主义、资本主义等。

默里从上述史学理论研究中得出了有力的结论,利用古希腊不断变化的叙事来阐明人类社会的宏大理论。他不仅分析了黑格尔、雅各布·布尔克哈特、尼采、布罗代尔等知名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影响,还考虑了后代人如何看待古希腊。《历史的缪斯》介绍了鲜为人知的“幕后秘密”——那些塑造了古希腊研究的重要人物,他们中有些人时至今日仍被学者所引用,有些已被遗忘。

(王悠然/编译)

